

贵州省博物馆藏莫友芝题跋杂稿考释

吴 鹏

莫友芝(1811-1871年),字子偁,别号邵亭,晚称瞿叟,贵州独山人,晚清著名文献学家,书法家。其书迹遗墨,人皆争藏,片纸只字,为世所珍。今贵州省博物馆藏有莫友芝题跋手稿一纸,乃由数段联结而成,稿上钤印有“莫友芝图书印”(朱文)、“莫氏子偁”(朱文)、“友芝私印”(朱文白文各一)、“邵亭”(白文)、“独山莫绳孙字仲武印”(白文)、“莫经农印”等七种,钤印散见行间,且多重复,从印文判知,此稿曾为友芝子孙递藏。稿存题跋七条,计金石类五条、书法类一条及诗文类一条。文稿书法行草杂糅,行间小字穿插,满纸钩乙,横涂竖抹;又多虫蛀残缺,辩读甚难。

第一条《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碑》跋虽与莫氏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所收《梁始兴忠武王碑》跋同指一碑,然跋文内容迥异;第四条杨文骢诗集题记与第六条朱为弼《吉金古文释》跋则分别刻于《黔诗纪略》和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之中,稿本与刻本只略有小异,本文于此不录;其余第二条隋大业塔盘跋、第三条汉《李昭碑》跋、第五条宗湘文所藏北齐《兰陵王肃长恭碑》跋和第七条赵文敏书朱子《戒自弃文》跋四条,未见他书著录和收入。故此稿虽为旧藏,内容却属新见。兹勉力识读,简要考释,并祈方家教正。

为保持原状,释文按原稿顺序依次编号。原稿中除第五、七条跋有题目外,其余皆无,在此即依文意重新拟题。无法识读的文字一律用□表示。

一、《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碑》跋

右两叠轩收□□楼□藏《梁始兴忠武王萧憺碑》,校以王兰泉所录,其漫漶依稀处,辄互有数字出入,如第□叶“时年数岁,所生吴太妃”云云,兰泉本阙“时、数、岁、所、妃”五字;“千里”下有“始登冠礼”四字,兰泉本亦阙。然有兰泉明载而此本模糊不辨者若干处,盖两拓相去不远,其出入则拓本致然,皆雍乾旧物也。碑在上元□北黄城村,于栖霞为近,闻乱后犹未亡,□向且歆,不易拓,故未有新本,不知更如何剥落矣。晋以来书家,北鍾南王,□足千世。王□有帖无碑,而子敬《桓山颂额》、《保母墓砖》,集帖摹收,尚存仿佛,假使二王书碑,决不仍用帖法,与元常(鍾繇)

以降魏齐旧拓不相径庭。义渊书《忠武》此碑，□极一时之选，□有不师法二王者，因此与《萧景神道》以上溯之，乃有以契二王真处，是在善悟者自得之耳。戊辰四月四日跋。

“两壘轩”为清代大收藏家吴云（1811-1883，字少甫，号平斋）的斋号。

吴云任官苏州之时，莫友芝与之过从甚密，时常讨论金石文字，饱眼法书名画，故能得观此碑并以增校王昶（1724-1806）《金石萃编》所载之缺误。

莫友芝《宋元旧本书经眼录》（同治刻本）附录二《金石笔识》中，收有《萧憺碑》跋文，后附全碑释文。据刻本，莫友芝认为此碑“其漫剥处，细审亦能得十二三，以较王兰泉《金石萃编》所录，可多识千许字”。尤其重要的是，友芝指出了王昶对此碑的误置，他指出：“（《萧憺碑》）碑阴未经磨砺，审无刻字，碑西向南侧，又直东石兽，盖其东碑；其西适有龟趺，东向南侧，直西石兽，其有西碑无疑。凡应刻碑阴者，当具其中，亡在宋以前矣。兰泉《粹编》乃指《安成西碑》阴为此碑阴，疏误之甚。”文后说：“文二千八百四十许字，全剥阙者八十馀字，兰泉录者一千三百六十许字，今增绎出千有二百二十字，正兰泉误释十六字，其识而未确及漫不可识者仅百八十许字。”

稿本未附释文，所载跋文与刻本所论亦大有所别，尤其对于魏碑文字与书法风格传承的见解，各有侧重。稿本谓“假使二王（羲之、献之）书碑，决不仍用帖法，与元常以降魏齐旧拓不相径庭”。又谓贝义渊书法，“有以契二王真处，是在善悟者自得之耳”。“不用帖法”、“以契二王”，实为友芝推测之论。晚清碑学之盛，因于帖学之衰。二王书法为帖学之祖，清代馆阁书翰，虽植根于二王法度，然其时书法言必称碑学，此本基于反帖学思潮的一种标榜。而如此悖论，在晚清文人的书法话语中，却是常见。相形之下，刻本之谓《萧憺碑》“上承锺、王，下开欧（阳询）、薛（稷）”，今若将锺王欧薛诸家作品与之联系对照，则此论较为中肯。

二、隋大业塔盘跋

右上方山隋大业塔盘，隶书廿四字，道光中张叔未得之李作舟聘，今归吴平斋。因盘势拓之，装为八纸，以存盘式，犹叔未手也。盘围丈有八尺，字径□寸许。

上方在苏州府西南三十里。乾隆四十八年癸卯，塔毁于火，后虽重建，而此刻竟亡，惜哉！此盘金石家所未见，字虽不多，而能与石经峪、水牛山、小铁山等佛经存汉魏遗法，是隋隶绝佳者，非唐人所能及。合吴越唐以前石刻存者，自汉数之，此不落第十外，因宜缩临，□无足数。随轩双钩，亦乏神明。平斋幸喜传希有古石，曷不精刻一通以诒海内同好？同治七年闰，吴门书局识。

塔盘，即佛塔每层上下方盘绕塔体的突出部分。莫友芝认为盘上隶书乃“隋隶绝佳者，非唐人所能及”，其实，隶书之盛，首在汉代，而至魏晋，则为魏

碑及二王行草之盛势所掩,隋唐亦未挺起。晚明以来,由于帖学书法的式微,书家学者转以访碑考证为尚,这同时也促动了清代大量先秦汉魏金石碑版的出土,世人多以此篆隶书法为临习范本,并努力体现自家面目,进而形成了有清一代声势浩大的碑学风潮。正是在此语境下,清人对于金石碑版的膜拜,反过来增加了他们对秦汉之后篆隶书法不振的苛责意气。

莫友芝还认为徐渭仁(?-1853或1854,字文台,紫珊,号隋轩)的双钩“亦乏神明”,未免强其所难。众所周知,拓片是直接覆于碑石而捶拓出来的复制品,能够逼真地呈现碑刻原貌;而双钩一般则是将纸覆于拓片之上,依原拓式样描画出来的次生品,当然离神较远。

莫友芝此跋落款时间与地点分别为“同治七年(1868)闰”、“吴门书局”,友芝时在江苏巡抚丁日昌(字禹生,号持静,1823-1882年)幕府,协助丁氏整理藏书,编校书目,后撰成《持静斋藏书记要》。

三、汉《李昭碑》跋

上方山在府城南二十里,一名楞伽山;上方寺在山顶,一名楞伽寺。《李昭碑》世所罕见,孙白渊《访碑录》有之,而云疑是伪作,不知其疑者何事。据字体论,固非超谊,然汉碑传世不工者,亦正不少,不能直决也。唯第一行有“富波”字,第二行“忠孝立仁行道实体弥隆”,大似袭《繁阳令杨君碑》。碑云“富波君之少子”,又云“长履忠孝,立仁行道,实体弥隆”,则太似袭之耳!一何十字相联之悉同耶?同治戊辰夏借观吴平斋藏本识。据莫友芝《邵亭日记》同治五年(1866)九月初五日载:

过首府三县辞行,唯吴、张竟不可见,遂过平斋观其所藏《李元靖碑》宋拓,略校于家本上。又观张从申所书《元靖碑》,亦旧拓完善者。其壁间悬汉《李昭碑》篆书,是雍正间褚千峰在宝鸡田间所拓十餘纸之一。明日千峰又往,思多拓以传,则已为其土人凿烂矣。盖秦中每有旧碑新出,上游必索本于州县,州县又以役扰其民,故民间必凿坏以避役,古石之遭此劫者盖不知凡几。此拓著录鲜,世亦罕传,因缩临一纸,携还著录之。^①

吴云于咸丰十年(1860)始署苏州知府^②,并在苏州建听枫园,雅集同好。莫吴二人交游,此间尤为频仍。吴云曾将《萧憺碑》、《隋大业塔盘》和《李昭碑》示与友芝,嘱请鉴赏作跋,友芝承允。同治七年(戊辰,1868年)初夏,友芝时寓吴门(苏州),以上三则跋文,即是此时为三碑而作。今上海图书馆所藏莫友芝致吴云的书札中,有一通即指此事,函云:

前奉假《李昭》、《萧憺》、塔盘三件,并略为题识,《归去来辞》四纸亦写就,遣同缴上,乞政。手肃,敬颂道安,不一。五月四日。弟友芝顿首。

^①转引自张剑: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,中华书局,2008年,第414页。

^②李铭皖等修:《同治》《苏州府志·职官七》。

平斋先生执事。^①

前揭友芝日记自言曾将《李昭碑》“缩临一纸”，后此纸为鼠所坏。吴云曾致信友芝，表示愿寄碑拓让友芝重摹，信中云：

《李伯明碑》（即《李昭碑》）兄樵本既为鼠碎，自须重摹，倘台从春间不能到苏，弟必将此碑拓本寄上，决不失诺。^②

《李昭碑》是否为褚千峰作伪，历来聚讼，除友芝跋语所谓孙星衍疑伪外，他如翁方纲、方若亦持此论，而桂馥则定为真。从莫友芝跋语看，他虽未明可否，然其语气则倾向《李昭碑》为伪作，如其谓此碑与汉熹平年间的《繁阳令杨君碑》文字雷同，疑有抄袭之嫌^③。

与莫友芝同代的李鸿裔曾录有潘宁（陋夫）的《李昭碑》跋，潘宁未疑其伪，文云：

汉篆李伯明残碑，尚存六行二十一二字。字体宽博有馀，与敦煌碑、嵩山诸阙迥别。雍正己卯，褚千峰自蜀还，路经宝鸡，于乱山荒榛中见此卧碣，随即椎拓十缣，次日携螭蜡而往，碑已损坏，无一完字。询诸村民，云恐以打碑而受吏扰，故毁之。此碣显于千峰，碎于千峰，一日之间，遂有沧桑之劫，可惜！可惜！潘陋夫记并题五言古诗于下。^④

今人张彦生《善本碑帖录》认为：“此碑翁方纲、孙星衍等疑伪，桂未谷考为真。曾见拓本，王任堂、徐紫珊、沈树镛、万中立等跋藏。通过近年出《袁敞》、《袁安》等碑，确定汉刻无疑。”^⑤结论未免武断。

四、宗湘文所藏北齐《兰陵王肃长恭碑》跋（见图）

同治丁卯秋来杭州，八月杪饮宗湘文太守，许获观旧拓北齐《兰陵王肃长恭碑》。今昔金石家悉未著录，海内殆无第二本，信希世奇珍也。道光初，此卷在龚定龕家，其剪裱错失处，夏玉父曾为整比释文，以入其《金石萃编补》，其谓每行三十二字，良然。然自三行半以下即属越，不尽可理其释文。信手成篇，无从□备，聊取具《金石萃编补》之一云尔。行间时有□（魏？）锡曾旁注，补正夏释十许字，甚允当。有未及者，条如左方：第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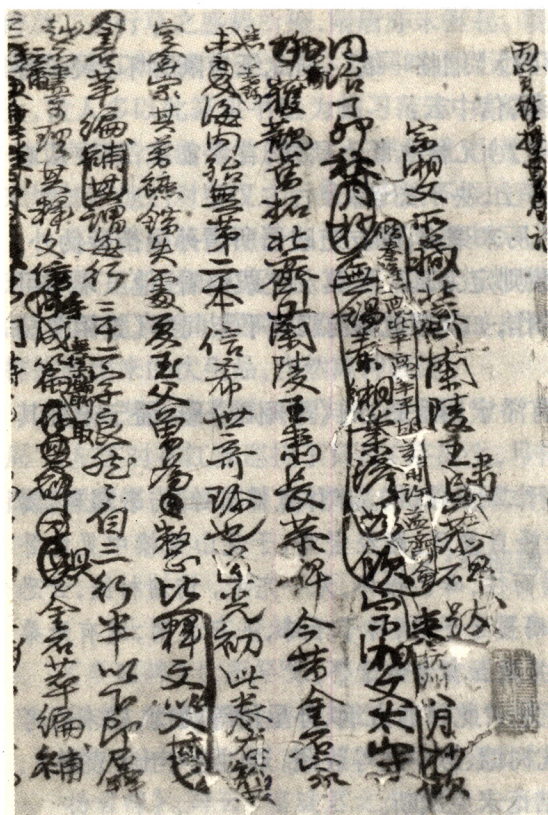
①周秋芳整理：《邵亭书札》，见《历史文献》第6辑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18页。

②吴云：《两壘轩尺牋》卷三《莫子偲孝廉友芝》，收于沈云龙辑：《近代中国史料丛刊》，台北文海出版社，1966年，第264册，第219页。

③案：宋人洪适《隶释》曾录《繁阳令杨君碑》释文，其首云：“（上缺二十九字）弟富波君之少子也，生姿令喆，长履忠孝，立仁行道，实体弥隆。”（洪适：《隶释》卷九《繁阳令杨君碑》，中华书局，1985年，第104页）莫友芝发现《李昭碑》中竟然与《繁阳令杨君碑》“十字相联之悉同”，故而感叹“太似袭之耳”。

④李鸿裔：《靠苍阁日记》“光绪七年正月廿三日”条，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》，复旦大学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18册，第150页。

⑤张彦生：《善本碑帖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84年，第11页。



叶龙首上盖“机”字，下字作“燃”，盖“焚”字，从𣎵，从樊声，一也；第三叶“称雄”下一字□王□□；第四叶“泳”当是“派”；第六叶“惟宝”上疑“舍”字，“返壁”疑是“进壁”；第十叶“乘”当是“表”；十四页“穷”亦似□；十五叶“仪”“同”二字不知从何错入“三师”上；十八叶“将中领军”，“将”乃“转”字；二十叶“功成受遗”当是“动成受道”，“道”之“首”上作“小”也；廿一叶“虎落虏庭”，“虏庭”当是“旁通”；廿四页“朝夕”上当是“逸”；廿七叶“动”疑是“勳”。○ ○(○当为友芝自名代号)剧□(惠?)读北朝碑，矧此卷洞心骇目者。明日游(下缺)

《兰陵王肃长恭碑》，又称《高肃碑》，是河北著名的“磁州三高碑”之一（另二碑为《高盛碑》和《高翻碑》）。此碑主人，即是富有传奇色彩的兰陵王高肃。高肃（541—573），字长恭，又名孝瓘，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孙、文襄帝四子，封徐州兰陵郡王，因受后主高纬忌恨，遭鸩杀。

《高肃碑》碑阳正文多可释读，而碑阴字迹模糊，难以辨认。今人马忠理先生曾对此作过深入研究，颇可参考^①。此碑虽以隶法为主，楷味却甚浓厚，北碑大气磅礴之势，呼之欲出。友芝谓其“洞心骇目”，实有所自。

友芝跋文谓此碑曾为龚自珍（1792—1841）所收藏，龚氏文集中也收有此碑题跋，其文曰：

按此碑今复出，方嘉道间孤拓仅存，固宜诧为珍异也。此碑未见诸家著录，即赵氏《金石录》，于北齐搜采略备，亦未及之。藏钱唐何梦华家，庚辰孟冬，举以相赠。隶法苍郁怒道，绝类蔡中郎《夏承碑》，又类《赵国令

① 详马忠理：《北齐兰陵王高肃墓及碑文述略》，《中原文物》1988年第2期；另刘心长、马忠理主编的《邺城暨北朝史研究》（河北人民出版社，1991年）也有该碑的清晰释文，第504—505页。

碑》，百金之字，宝之。定盦道人跋。^①

清方若《校碑随笔》谓《高肃碑》“旧拓只半截，后于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）掘出之，始拓全碑”^②，由此可知，此碑原先只有半截露出地面，在光绪之二十五年之前包括龚自珍与莫友芝作跋之时，都未见得全形。

莫友芝此赏碑题跋之事，在其《邵亭日记》中也有记载，同治丁卯八月二十九日（9月26日）记：

（宗）湘文招午饮，观其所藏北齐《兰陵王萧碑》旧拓本，金石家皆未著录，字意在《陇东王》、《西门君》两碑间，而隶意稍多。假归，当细临录一过。识绩溪胡荻甫澍中书。^③

宗湘文（1834—1897），名源瀚，字湘文，斋号颐情馆，江苏上元人。少曾佐理幕府，后保为知府。友芝所作对比的《陇东王》（即《陇东王感孝颂》）和《西门君》（即《西门豹祠堂碑》），都是北齐时代比较有代表性的碑刻。

五、赵文敏书朱子《戒自弃文》跋

右赵文敏书《戒自弃文》一卷，其自跋但云于此文有感，故累书以示人，而不言何人之文，或以为是朱子作，当时习见，不待著耳。而《晦庵集》及《续》《别》两集皆不收，惟雍正中朱玉所刊《大全文集》，□编始与《童蒙须知》、《从学帖》等附全书之末，盖集外文自家乘搜出者。方小东（方朔）州守又持示抱冲斋刻赵书，亦有此文而字差大，足证文敏累书示人之说。虽玉刊是集，搀割无绪，《四库》黜之存目，而此文之警醒切挚，固与《童蒙须知》等皆为行远登高、植基启途，开于来学甚钜，则又旧编不应逸者也。同治初元喻觐勋总戎收此卷于安庆，曾为审定真迹，即摹一本以存。庚午春，觐勋于金陵选工钩鐫，将致石于宁乡家祠之塾，夏六月就功。又为识其后，独山莫友芝。

跋文中“赵文敏”即赵孟頫。莫友芝所跋赵孟頫所书朱熹《戒自弃文》，即《不自弃文》，收于清人朱玉（朱熹十六世孙）所刊《朱子大全文集类编》附录《庭训》中，自南宋至清初，此文皆未见于朱熹文集中，如友芝所言“《晦庵集》及《续》《别》两集皆不收”，实至雍正间朱玉才将之收入此编，而其真伪一直存疑。又《类编》于此文之后还将朱柏庐（1627—1698年）《治家格言》改题为《家居要言》扉入，友芝责之“搀割无绪”，因此更增朱玉选编之可疑。然今人

①龚自珍著，夏同蓝编：《龚定盦全集类编》卷三《跋北齐兰陵王碑》，世界书局，1937年，第60页。案：友芝所谓“夏玉父整比”，又提及《金石萃编补》一书，据笔者查检，至今未得其果，俟再作考。

②方若：《校碑随笔》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，1997年，第173页。

③转引自张剑：《莫友芝年谱长编》，第442页。

朱杰人先生等主编的《朱子全书》则将之收入^①，并注为朱熹于绍兴十五年（1145）所作，此与束景南先生所推论为十四岁作相近^②。赵孟頫所书《不自弃文》，也多收于历代法书著录之中^③，赵氏与朱熹（1130—1200年）皆生于南宋，赵书作品的真伪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印证此文的真伪。另，莫友芝谓此跋稿“有清稿夹此页中”，今未见。

赵孟頫“累书”之作颇多，从《历代著录法书目》中更可见其所书《千字文》、《洛神赋》、《归去来辞》等古文各体多种，如现存行书《归去来辞》，便有三本分藏于上海博物馆、辽宁博物馆及浙江湖州博物馆。

莫友芝在此跋题目后注：“有清稿夹此页中。”然贵州省博物馆藏稿中未见此清稿。近日于雅昌艺术网偶见北京诚轩2012年5月14日蝇国书画春季专场拍卖会上，载有题名为“莫友芝同治庚午（1870年）作跋赵孟頫书《戒自弃文》立轴”之拍品，共二小张，规格27.8cm×16.8cm，固非立轴。小楷精抄，疑即莫友芝所言之“清稿”，因其文与草稿小异，兹录附于后：

右赵文敏书《戒自弃文》一卷，其自跋但谓于此文有感，故累书以示人，而不言作者，或以为是朱子之文，当时共知，不待著耳。而《晦庵集》及《续》、《别》两集俱不收，本朝雍正中朱玉所刊《大全文集类编》，始与《童蒙须知》、《从学帖》等摭附全书之末，盖集外文自家乘出者。方州守朔又持示抱冲斋近刻赵帖，亦有此文，而字差大，足证文敏累书之说。虽类编之刻，撙割无绪，七阁《四库》黜诸存目，而此文之提掖警切，固与《童蒙须知》等为行远登高、植基启塗，开于来学甚钜，则旧编所不应逸者也。同治初元喻总戎吉三收此卷于皖口，曾为审定真迹，摹一本弄篋中。越九年庚午春，总戎于金陵选善手钩镌，以致湘乡家祠之塾，以诏族之子弟。夏六月既就功，属为覆勘，因识其后，独山莫友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贵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

①朱杰人等主编：《朱子全书》第26册《朱子遗集》卷四《杂著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696页。

②束景南：《朱熹作〈不自弃文〉考辨》，《红楼梦学刊》1992年第3辑，第346页。

③朱家潘主编：《历代著录法书目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1997年。